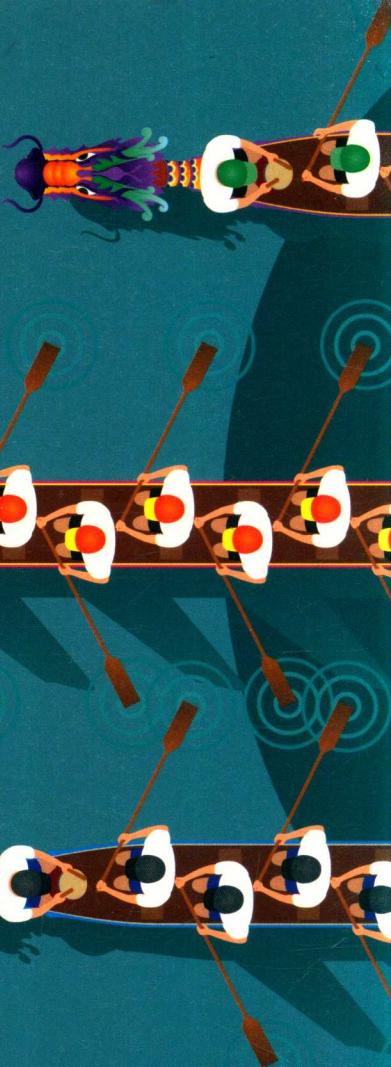


本研究选取了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在每年惯例活动流传下来的龙舟竞渡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历史学上的方法及文化人类学上的方法，把关于近年来发生的其观光化演变作为文化的问题进行论述。其中对苗族龙舟竞渡的“传统的再创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民俗化”、“观光化”等文化资源化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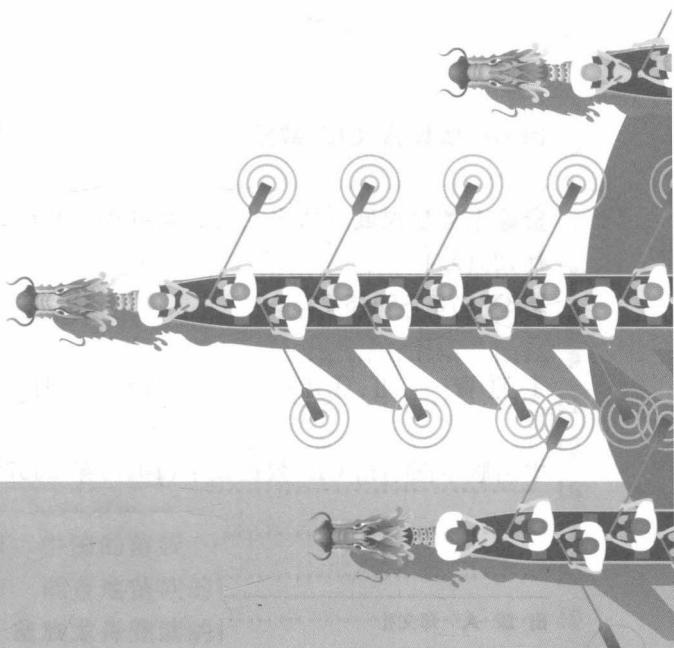
孟蒙◎著

资源人类学视域下 清水江苗族龙舟竞渡的 观光化演变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项目编号: 20720171091



孟蒙◎著

资源人类学视域下 清水江苗族龙舟竞渡的 观光化演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源人类学视域下清水江苗族龙舟竞渡的观光化演变/孟蒙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5615-7231-3

I. ①资… II. ①孟… III. ①苗族—龙舟竞赛—研究—贵州 IV. ①G852.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3781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文慧云

封面设计 李夏凌

技术编辑 朱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编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 xmupress@126.com

印刷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11.75

插页 1

字数 25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及背景	1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探讨	2
第二章 调查地概况	8
第一节 贵州省	8
第二节 贵州省黔东南州	9
第三节 施秉县及台江县	11
第四节 “施洞口”和清水江龙舟竞渡分布状况	13
第三章 调查地苗族的概况	16
第一节 中国的苗族	16
第二节 调查地苗族的历史和文化	22
第四章 苗族龙舟竞渡的概况	49
第一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历史及起源传说	49
第二节 苗族龙舟的构造与制作	66
第三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规则与身体技法	86
第四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仪礼和禁忌	99
第五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鼓头制和迎龙仪礼	104
第六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文化演变	112
第五章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和苗族龙舟竞渡	119
第一节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概况	119
第二节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用:以贵州省和台江县为例	127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独木龙舟节”	131
第六章 苗族龙舟竞渡的观光化演变	141
第一节 中国的文化产业政策	141
第二节 贵州省的文化产业政策	145
第三节 苗族龙舟竞渡的文化资源化	149
结 语	176
参考文献	17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及背景

中国共有 56 个民族,分别是占全国总人口九成的汉族以及 55 个少数民族。

本研究选择了这 55 个少数民族之一的苗族,研究关于分布于贵州省清水江流域一部分该民族每年定例活动之一的龙舟竞渡,并对其观光化演变进行论述。

在 2010 年的统计中,苗族的人口为 9 426 007 人,分散于中国西南部,集中居住在贵州省及湖南省,特别是有大约半数人口在贵州省生活。苗族的中心位于清水江流域,他们因拥有长期与汉族王朝对抗的历史,而被评价为勇猛的民族,他们从其祖籍居住地长江(扬子江)流域不断南下迁徙,直至今天的居住地。他们的龙舟竞渡是把三条独木舟(25~30 米的狭长形状)绑成 1 条,而且人们是站着划船的,从这一点上看,其和中国南部其他地区的龙舟竞渡是有区别的。此外,他们将“斩龙传说”作为起源,而其他地区并未流传这一说法,因此从这一点看来也是很奇特的。

这样,虽然龙舟竞渡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每年五月的惯例活动在苗族内部被传承下来,然而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却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提倡与以往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文化产业模式,这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内陆“西部大开发”项目(2000 年)。在这个项目中,政府奖励可持续文化资源的发掘及活用,并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存在国家指定、省级指定等多个阶段)的导入就是一个例子。

这样的发展趋势,对于在经济发展中往往处于落后地位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个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来开创自身发展的绝佳机会。

一般说来,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经常伴随政府指导的保驾护航,苗族也不例外。

在本研究中,将对“清水江苗族是如何与贵州省政府及台江县政府等进行合作,从而使他们的龙舟竞渡观光资源化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第二节 先行研究的探讨

除了中国以外,龙舟竞渡在东南亚及日本等地区也有进行,而且关于这些的研究也甚多,在此,本研究将围绕以中国贵州省清水江苗族的龙舟竞渡作为问题进行论述的相关研究,来进行先行研究探讨。

在进入探讨之前,首先对最早期的苗族研究进行概括说明。

人类学领域最早着手对苗族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日本的鸟居龙藏。1902年到1903年间,他对中国西南部的苗族进行了田野调查。他的《苗族调查报告》是第一部人类学专业意义上的苗学专著,其中较为完整地记载了苗族的名称区分、地理分布与神话、体制与语言、土俗及土司制度、服饰与乐器等内容,并进行形态测定,同时根据传承及史料推断出他们的迁徙路线。法国萨维那(F.M.Savina)著有《苗族史》(*Histoires des Miao*),其虽身为教会传教士,但掌握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方法,并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完成了研究。《苗族史》的主要内容分为“苗族语言的比较研究”以及“历史与分布及信仰”这两个部分。后有英国传教士克拉克(Clark S.R.)的《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与波拉德(S.Pollard)的《苗族纪实》(*The Story of the Miao*)都是早期对苗族的人类学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有中国早期民族学者杨万选所著《贵州苗族考》、梁聚五所著《苗族发展史》,以及吴泽霖、陈国钧、杨汉先、凌纯声等所撰论文数十篇。以上资料虽未曾对苗族的龙舟竞渡有过描述,但都是撰写民族志时的重要文献,故在先行研究中列出,以作为本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重要一环。

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中央民族研究所”学者文崇一著有《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赛神》,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关于龙的起源,龙与水神的关联,龙舟与龙舟竞渡等内容。文中对龙舟与龙舟竞渡的起源、龙舟竞渡与屈原投江的传说、龙舟竞渡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龙舟竞渡在宗教上的功用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对龙舟竞渡的方法、龙舟的构造、龙舟竞渡的日期、龙舟竞渡的地理分布等列举了大量的资料论证。并得出三点推断:“一、龙舟竞渡的起源与存在意义与古时信鬼好巫有关,且其很有可能是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二、祭祀屈原、伍子胥等人物是在龙舟竞渡起源之后附会上的;三、龙舟竞渡与祈求风调雨顺、祛病消灾、年丰时稔息息相关。”总体来说,这是一部近现代时期珍贵的龙舟史料,其较完整地编集了从古至今的龙舟记载,为今后龙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参考价值,但可能由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缺少了对贵州地区龙舟竞渡的记载。

20世纪40年代,与中国早期民族学者吴泽霖、杨汉先等人同在大夏大学^①的德国人类学家鲍克兰(Inez de Beauclair)在贵州的人类学调查报告《中国西南地区的部落文化》(*Tribal Culture of Southwest China*)与《贵州省境内非汉民族部落的文化特质》中对贵州省东部清水江苗族的龙舟有所记载。其中鲍克兰把龙舟竞渡举行期间称为龙船节(*Dragon-boat festival*),并详细描述了举行日期、地点,平日存放龙舟的龙舟棚,龙舟形制和竞渡人员分配,“迎龙仪礼”及服装配饰等内容。他指出龙舟竞渡是每年农历五月举行的惯例活动,进行龙舟竞渡的苗族在贵州省是当地唯一的黑苗,并推断他们是在距当时500年前移居到此地,之后此地便有了龙舟竞渡这项活动。此外,资料显示,他们有可能是从现今湖南省汨罗江一带沿沅江往上游迁徙此地的。这两份报告中的内容不仅描述了民国时期苗族龙舟竞渡的境况,也有大量记录苗族生产生活、婚嫁风俗以及作者自己的分析推断,成为记述苗族龙舟竞渡这一时期境况的珍贵史料。

1958年,由费孝通等一批学者组成中央民族调查团对苗族进行了考察与识别,并出版了《贵州省台江县苗族的节日》一书。到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成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贵州省编辑组)把1958年的上述资料一并编进《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丛书。

书中记录了龙舟竞渡分布区域、传说由来(三个)、龙舟形制、制作新船的祭祀仪式、龙舟人员分配、龙舟节期间的盛况等并附有参加龙舟竞渡的村寨名单与龙舟数量,以及在附上的一份补充调查报告中记录了龙舟节在经历“土地改革”“大跃进”时期影响后的变化。

并得出以下结论:(1)龙舟节作为苗族的传统活动应当被保留下来,在客观上它促进了生产,而不是妨碍生产。(2)“大跃进”时期,对龙舟活动的强行改变是错误的(如改变时间、地点,要求妇女划赛龙舟等),得出风俗习惯的改革要通过本民族内部协商去实现才会产生良好效果的结论,如果只凭几个干部的主观愿望做出硬性改变,实践证明其效果并不好。(3)认为龙舟节期间的粮食耗费巨大,造成了浪费,而且龙舟节的禁忌与仪式是迷信且不健康的,因此应该实施破除迷信的教育。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被禁的大批文化活动,包括苗族龙舟竞渡都逐渐得到了恢复,相关调查也得以重新展开,并开始了与国外进行文化研究等方面的交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龙舟研究专家君岛久子在与中国吴泽霖等一批学者交流后撰写了《贵州苗族在清水江上的龙舟竞渡》一文,她翻译了《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中对龙舟节的调查报告,把中国古文献当中出现的龙舟竞渡日期与苗族龙舟竞

^① 大夏大学(The Great China University)是由1924年因学潮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大夏”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二战期间曾西迁贵阳,与复旦大学合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联合大学,光复后迁回上海。1951年10月,在原校址与光华大学相关合并后成立华东师范大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办的第一所师范大学。

渡日期进行了对比研究，并结合之前对龙舟的研究，列出除日本长崎、冲绳等地进行大型的龙舟竞渡与祭祀之外，中国大陆南部的全域以及东南亚各地都盛行龙舟竞渡及相关祭祀活动，而这些与当地民族信仰、宗教仪式、古时传统文化的根源都有相应联系，希望中日可以对龙舟竞渡进行联合实地调查。除此之外，君岛还撰写有《龙神（龙女）传说与龙舟节》《龙舟竞渡考——以“武陵竞渡略”为中心》《中国文献中的龙舟竞渡——以方志资料为中心》等龙舟方面的文章。

寒川恒夫在其博士论文《稻作民族传承的游戏之文化史考察——以东亚、东南亚地区为中心》（1981）第二章“竞舟”第一节“南中国的竞舟”中对清水江苗族的龙舟竞渡有过详细的描述。在基于鲍克兰以及中国相关部分的史料上，对其地区黑苗的迁移、龙舟竞渡的宗教性等问题做了探讨。

日本学者铃木正崇曾两次到台江施洞进行田野调查，并对苗族龙舟竞渡（文中称龙船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第一次调查后与金丸良子两人共同完成《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1985）一书，其中在第十二章对龙舟节与姊妹节进行了探讨，并得出龙船节是男人的节日，具有天地再生的文化象征；姊妹节是女人的节日，具有社会得以存续的社会功能。铃木在1985年结束第二次调查后，撰写了《关于龙舟节的考察——以贵州省苗族为例的研究》（1988）一文，其中详细记载了考察中对龙氏的访谈与相关龙船节内容的补充，并结合龙船节的起源传说探讨了举行龙船节村寨的地理分布与社会秩序的内外在联系，最后继续对龙船节与姊妹节做了对比反思，得出龙船节的仪礼具有外在化的远心指向，代表了与祖先（灵的存在）之间的交流；姊妹节的仪礼具有内在化的向心指向，代表了以家为中心的婚姻。

此外，铃木还著有《祭祀与世界观的变迁——中国贵州省苗族的龙船节》（2010年）及《苗族历史与文化的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族的想象力变迁》（2012年），文中记述了龙舟节的起源传承（七个版本的分析比较）、祭祀执行的流程，龙舟节和姊妹节的比较等内容。

在中国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各学科人文学者（包括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等领域）开始对苗族龙舟竞渡进行探讨和研究。1985年，吉星著有《中国民俗传说故事》，文中搜集了关于苗族龙舟的传说由来；1988年，吴通发撰有《贵州清水江苗族龙舟节》一文，当中第一次使用了“龙舟节”的称谓。同年，张建世撰写的《中国的龙舟与竞渡》、段双印的《龙舟竞渡新论——苗族龙舟节启示录》、孙霄的《黔东南苗族的独木龙舟文化》等文章中开始使用“独木龙舟”的叫法。至1990年“施洞龙船节”期间，由政府组织在当地召开了中华龙舟文化研讨会，并在次年出版了论文集《中华龙舟文化研究》，其中的议题有“龙舟与民族意识”“龙舟探源”“龙舟竞渡研究”“龙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清水江龙舟文化特征”“龙舟的文化价值与功能”“龙舟活动习俗”“龙舟之文艺分析”“龙舟文化管理”等。之后，于90年代发表的有杨学军的《清水江流域苗族龙舟节》、田军的《清水江苗族龙船节来源传说辨析》以及钱星的《浅述清水江畔苗族的龙舟文化》等文章。这一时期文献研究的重点依旧探

讨龙舟的起源、对现实状况的描述,以及把苗族的龙舟竞渡作为中华龙舟中的一部分来探讨论述其功能作用等。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苗族龙舟竞渡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开始增多。佐竹绘美在 2006 年发表了《苗族的龙舟竞渡——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的田野报告》一文,其中包括笔者在 2005 年到施洞对苗族龙舟竞渡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笔记,文中写到随着观光化的出现引起的相关仪式被简化的状况,虽然其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但也能看出人们开始关注观光化的演变。同时,佐竹还强调应该对苗族仪式中的古歌作进一步研究的看法。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中国,苗族龙舟竞渡方面的研究开始被体育领域的学者关注。研究分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化学、美学等)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体质人类学、运动生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人文学及文化领域)方面,卢塞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在 2007 年的《贵州苗族独木龙舟原生态竞渡文化探析》一文中,对独木龙舟竞渡的传说、祭祀仪式、当地苗族的生活形态、社会组织形态、龙舟制作、竞渡的操作技法、组织规则等内容进行了阐述。得出了独木龙舟文化的形成与苗族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结论,其中宗教信仰是古老龙舟起源的文化核心,祭天、敬神的图腾崇拜意识来源于苗家人的多样性生活形态,各种生活方式融入自然的观念都充分体现出苗族独木龙舟的文化、社会价值取向等观点。2008 年,卢塞军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苗族独木龙舟文化追踪”为题主持申请到“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在 2011 年,发表《贵州苗族独木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象追踪研究》一文,其中将独木龙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得出了独木龙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了解苗族文化,展现多彩贵州少数民族文化风情的“文化名片”的结论。因此,继续深入挖掘、整理、保护其深厚的非物质文化景象,继承其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同样在文化领域方面,2010 年,胡小明在《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二)》一文中指出,黔东南苗族的独木龙舟是从竞技到体育变化进程中的活化石,至今仍不具有体育性质,应将其视为一种带有民族特性的巫术仪礼的遗存。

另外,在体质人类学方面,2009 年杨世如在其发表的《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体质人类学分析》一文中,对黔东南地区清水江及其支流巴拉河流域的 37 个苗族村寨的独木龙舟竞渡的选手进行了体质形态的调查测试,并将其结果与全国成年人、青少年以及国际标准竞技小龙舟运动员的体质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比较结果显示,苗族独木龙舟作为一项旨在提高民族凝聚力和延续力的传统习俗,并无体育意识和健身动机,同时因为缺少持续的锻炼,对苗族的身体发育并无显著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截至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对苗族龙舟的分布、社会性功能、起源传说、历史、现状报告、祭祀仪式、社会组织、龙舟制作、竞渡的操作技法、规则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龙舟竞渡选手的体质形态调查为主的。而本研究把苗族龙舟竞

渡的观光化演变作为研究对象,这一点无疑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过的原创部分。

表 1-1 与苗族龙舟竞渡相关的现代论文文献一览表

文献	出版年份	论文名	作者名	出 处
日语论文	1980	稻作民族传承的游戏之文化史考察——以东亚、东南亚地区为中心	寒川恒夫	筑波大学学术博士论文
日语文章	1977	龙神(龙女)传说与龙舟节(1)	君岛久子	《日本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2 (1),第 34~62 页
	1980	龙舟竞渡考——以“武陵竞渡略”为中心	君岛久子	《东南亚·印度的社会与文化》(上),第 441~462 页
	1980	贵州苗族在清水江上的龙舟竞渡	君岛久子	《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第九、十合并集》,第 73~80 页
	1986	中国文献中的龙舟竞渡——以方志资料为中心	君岛久子	《日本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11 (2),第 543~593 页
	1988	关于龙船节的考察——以贵州省苗族为例的研究	铃木正崇	《〈围绕汉民族的世界〉调查研究报告》,25,第 105~123 页
	1990	龙舟竞渡考——中日民俗活动的比较研究	林蚊中	《比较民俗研究》1 号,第 22~74 页
	2006	苗族的龙舟竞渡——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的田野报告	佐竹绘美	《地域研究》2 号,第 213~222 页
	2010	祭祀与世界观的变迁——中国贵州省苗族的龙船节	铃木正崇	《法学研究》,83 (2),第 181~254 页
中文文章	1961	九歌中的水神与华南的龙舟赛神	文崇一	《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1,第 51~124 页
	1988	贵州清水江苗族龙舟节	吴通发	《中华龙舟集刊》,第 93~105 页
	1990	清水江流域苗族龙舟节	杨学军	《民族论坛》,3,第 89~90 页
	1996	清水江苗族龙船节来源传说辨析	田军	《贵州民族研究》,66 (2),第 107~113 页
	2000	浅述清水江畔苗族的龙舟文化	钱星	《贵州民族研究》,82 (2),第 109~113 页
	2007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原生态竞渡文化探析	卢塞军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暨民族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集》,第 80~86 页
	2008	黔东南台江施洞“子母船”在太平洋文化史上的意义	吴春明	《贵州民族研究》,123 (5),第 157~167 页
	2008	舟船史活化石——苗族独木龙舟文化	吴思震	《中国魅力》,7,第 74~83 页
	2009	黔东南龙舟活动的起源、现状与对策研究	吴萍	《贵州民族研究》,129 (5),第 63~68 页
	2009	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体质人类学分析	杨世如	《体育科学》,29 (7),第 78~83 页
	2009	苗族独木龙舟文化调查	张红娜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1 (4),第 111~116 页

续表

文献	出版年份	论文名	作者名	出 处
中 文 文 章	2009	黔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	胡小明	《体育学刊》,16(12),第1~8页
	2009	体育人类学田野工作运用实践——苗族独木龙舟竞渡调查方法例证	杨世如	《贵州民族研究》,130(6),第84~88页
	2010	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体育人类学的实证研究(二)	胡小明	《体育学刊》,17(1),第1~9页
	2010	苗族独木龙舟原始竞技的体育文化遗产界定	杨世如	《体育学刊》,17(8),第94~97页
	2010	原始礼仪竞技的体育人类学研究——苗族独木龙舟竞技文化调查	杨世如	《贵州民族研究》,135(5),第64~68页
	2011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非物质文化遗产景象追踪研究	卢塞军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45(6),第69~74页
	2011	黔东南苗族独木龙舟节——桡手服饰及文化内涵	于倩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9(4),第61~65页
	2012	苗族独木龙舟竞渡形式美学研究	周华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136(6),第15~18页
	2013	贵州苗族独木龙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察	代刚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134(2),第190~195页
	2013	苗族独木龙舟活动身体技法研究	朱继伟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9(12),第50~52页
	2014	贵州省民族传统节庆体育商业模式的研究——以镇远五月初五端午节赛龙舟及施洞独木龙舟节为例	朱娜	贵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资料来源：笔者编制。

表 1-2 与苗族龙舟竞渡相关现代文献一览表(著作、论文集以及研究报告)

文献	作者及出版年份	书名及课题项目	出版者	备注
日文著作	铃木正崇、金丸良子(1985)	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	古今书院	
	铃木正崇(2012)	苗族历史与文化的动态——中国南部山地民族的想象力变迁	风响社	
中文论文集及课题项目	吉星(1985)	中国民俗传说故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潘光华搜集,龙船节传说由来(苗族)
	张建世(1988)	中国的龙舟与竞渡	华夏出版社	“独木龙舟”这一称谓的最早出处
	李瑞岐、杨培春(1991)	中华龙舟文化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论文集编集成书出版
	卢塞军(2008)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苗族独木龙舟文化追踪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TY007)	研究报告

资料来源：笔者编制。

第二章

调查地概况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贵州省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所传承的“龙舟竞渡”，其分布在中国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清水江流域。故本研究把田野调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级别：宏观所指的是，对贵州省、黔东南州以及所在县的整体状况进行调查；而微观指的是具体的调查以及研究主体，即清水江流域进行龙舟竞渡的村寨以及当地的苗族。

第一节 贵州省

贵州，简称“黔”或“贵”，地处中国的西南腹地，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平均海拔1 100米。与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诸省相接壤，自古以来一直是西南地区陆路交通的重要枢纽。贵州建省虽然只有500多年，但是从文献资料所显示的信息看来，贵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早。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当时在今天的贵州境内有牂牁古国，此国与中原有往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属巴郡、蜀郡、黔中郡和象郡管辖。“贵州”这一名称，始于宋朝（公元960—1127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①带领其控制的“矩州”^②归顺宋朝。因当地土语中“矩”音同“贵”，故宋朝开始称“矩州”为“贵州”。宋朝的敕书中记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是用“贵州”来命名此地区的最早记载。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史，正式建制为省，以

^① 普贵，北宋初年矩州以西（今贵州大方一带）人。土著首领。北宋初年，其祖父罗氏入侵矩州（今贵阳市），驱逐当时矩州领主谢氏，毁其城垣，改名黑羊箐，自己则驻扎石人山（今贵阳市白云区）控之，自称“石人部落”。宋太祖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普贵晋京，以所领矩州之地归顺宋朝廷，宋太祖封普贵为矩州刺史。

^② 矩州，唐武德四年（621年）置，今贵州贵阳市。辖境相当今贵州省贵阳市及清镇、龙里、修文等市县部分地区。

“贵州”为省名。^①

贵州省的全年日照时数是1 200~1 600小时,年均气温在14℃~18℃,大部分地区降雨量在1 100~1 300毫米,是一个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关西丘陵之间的亚热带高原山地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②境内山峦起伏,地貌类型复杂,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人类生存繁衍。乌蒙山脉、大娄山脉、武陵山脉、苗岭山脉纵横于贵州全境。南北盘江、红水河、乌江、舞阳河、清水江、都柳江等珠江及长江水系的各支流奔流于万山丛中。在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中,97%为山地与丘陵,故贵州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地”的说法,是中国境内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其中岩溶地貌达到73%,溶洞极多,喀斯特地貌^③的面积达到109 084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1.9%,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④。

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特有的地形地貌,贵州高原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古代民族交汇的大走廊和民族集结地。除汉族外,全省有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7个世居的少数民族,占全省总人口数的39%。现在,贵州省的管辖范围是贵阳市、遵义市、六盘水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第二节 贵州省黔东南州

黔东南因地处贵州省东南部而得名。地跨东经107°17'20"~109°35'24",北纬25°19'20"~27°31'40",东与湖南怀化地区比邻,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河池地区接壤,西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抵遵义、铜仁两地区。境内东西宽220公里,南北长240公里,总面积30 282.34平方公里。^⑤州境雨量充沛,河流纵横,水力资源丰富。境内有大小河流2 900多条,以清水江、舞阳河、都柳江为主干,呈树枝状展布于各地。所有河流均分属两个水系,苗岭以北的清水江、舞阳河属长江水系,苗岭以南的都柳江属珠江水系。清水江自西向东流经丹寨、麻江、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

^① 李平凡:《贵州世居民族迁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8页。

^②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③ 喀斯特地貌(Karst Landform),是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岩石(大多为石灰岩)进行溶蚀等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的总称,又称熔岩地貌。我国云贵高原、湖南南部郴州等地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贵州处于世界喀斯特地貌的腹心地带,全省面积的近四分之三属于喀斯特地貌。

^④ 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情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⑤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河、天柱的九县及市，主要支流有重安江、巴拉河、南哨河、乌下江、八卦河、亮江、鉴江等。^①

在春秋以前，黔东南属牂牁国，楚国时期称“黔中地”，后分属夜郎国。秦时设“黔中郡”，汉时改为“武陵郡”。在隋代属牂牁郡、沅陵郡和始安郡，唐代改“郡”为“道”后，属“黔中道”。元代在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②，故黔东南分属四川播州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慰司和新添葛蛮安抚司所管辖。明清时期推行“改土归流”^③、“开辟苗疆”，废思州宣慰司，分置镇远府、黎平府和新化府等，隶属贵州布政司所管辖。民国初期，改府、厅、州为县；民国十二年（1923年）废道，各县直属于省；^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6年，撤销镇远专区，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州辖凯里市及丹寨、麻江、黄平、施秉、镇远、岑巩、三穗、天柱、锦屏、黎平、从江、榕江、雷山、台江、剑河15个县。

黔东南2017年户籍人口475.99万人，年末常住人口352.37万人，有苗族、侗族、汉族、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等47个民族，常住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1.1%，其中苗族人口占43.0%，侗族人口占30.4%。^⑤唐宋以前，黔东南是苗、侗等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他们是最早开发了这块土地的民族。自明代起，大批汉族移民及屯军进入黔东南，他们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长期杂居，在经济、文化上相互交流、影响，后经历战争和朝代的更替，形成了今天的以苗族、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

^①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②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土司制度是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笼络藩属），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

^③ 中国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雍正帝对此甚为赞赏，令其悉心办理。六年，又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在黔东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同时废除原来土司的赋役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云南、贵州改土归流的目标，到雍正九年基本实现。

^④ 参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网站：《黔东南概况》，<http://www.qdn.gov.cn/info/4111/18141.htm>，下载日期：2018年11月14日。

^⑤ 参见黔东南州人民政府网站：《黔东南概况》，<http://www.qdn.gov.cn/info/4111/18141.htm>，下载日期：2018年11月14日。

第三节 施秉县及台江县

一、施秉县

施秉县地处贵州省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西北部，位于东经 $107^{\circ}52'37''$ 至 $108^{\circ}28'47''$ 、北纬 $26^{\circ}46'46''$ 至 $27^{\circ}20'16''$ 之间。东与镇远，东南与剑河，南与台江，西与黄平，西北与余庆，北与石阡等县接壤。县城西南距省会贵阳230公里，南距州府凯里111公里。全县南北长62公里，东西宽60公里，总面积1543.8平方公里。^①全县辖4乡4镇64个行政村及10个社区，居住汉、苗等19个民族，总人口16.9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5.5%。^②

清水江位于施秉县南面，是施秉和台江两县的天然分界线。清水江自黄平西进，流经双井、马号、六合等乡、镇南部，东出剑河县境，境内流程约四十公里，河面最宽处为125米，最深处为15米，是当地重要的水上交通线。施秉县所辖苗族大部分定居在清水江北岸，与南岸台江县施洞镇所辖苗族互通有无，同宗同源。

据清代《苗疆闻见录》记载：“胜秉，即施秉旧县地，在清水江北岸，距施洞口七里，今为施秉县丞分驻之地。雍正十年，台拱苗渡江焚旧施秉县即此。土人呼为老县，为苗夷互市处，月以三七^③相递，每岁七十二市。”^④据《施秉县志》（风俗·龙舟竞渡）记载：“县城及胜秉分县城，以五月五日，平寨铜鼓塘、各苗寨，以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日，船用长木刳成，首尾具备，施以彩色，荡漾波心，蜿蜒有势，颇足观赏。居人是日，用箬叶裹米制成，多角形者曰，‘羊角棱’，长者曰，‘枕头棱’，食之曰，‘解棱’，有宴会必备，红苋菜一盏，以啖宾。”^⑤

胜秉即是施秉县老县城的旧址，与台江县施洞的平兆隔岸相望，据调查最早定在五月初五进行龙舟竞渡的便是在胜秉。清朝雍正十年，“改土归流”导致战乱，胜秉被毁，故平兆代替胜秉，开始在五月初五进行竞渡。现今，在五月初五进行竞渡的只有平兆，而其他地区，包括施秉县的新县城双井镇所辖平寨、铜鼓塘、鲤鱼塘、寨胆等沿江村寨，以及马号乡平地营、六合乡冰洞、溪口、料洞等大小十余沿江村寨则是在五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进行龙舟竞渡。

^① 贵州省施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施秉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② 参见施秉县人民政府官网：《施秉县概况》，<http://www.qdnsb.gov.cn/info/18568/226298.htm>，下载日期：2015年2月27日。

^③ 每逢初三初七。

^④ （清）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⑤ （民国）朱嗣元编：《施秉县志》，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5年），原本为民国九年（1920年）稿本二卷。

二、台江县

台江县位于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部，苗岭主峰雷公山北麓，清水江中游南岸。境内群山起伏，层峦叠嶂，在清代及民国初期，曾是“苍山莽莽，箐深林密”。其地理位置在北纬 $26^{\circ}24' \sim 26^{\circ}53'$ ，东经 $108^{\circ}03' \sim 108^{\circ}31'$ 之间。东南与剑河交界，西南与雷山相连，西邻凯里，北与黄平、施秉毗邻。南北长50.4公里，东西宽36.7公里，全县总面积为1206平方公里。^①

台江县地处贵州高原东部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总体地势由西南向东北陡降。清水江环绕县境北端，与南端施秉县呈隔岸相望之势。巴拉河、翁你河、翁密河自南向北，向东流淌，注入清水江，水资源尤为丰富。全县有近百条溪河把大地切割形成中山、低中山、中低山和低山山地，群山葱绿，林木苍翠。坡度由西南边缘掌水坪高峰的1980米，降至东北部的清水江峡谷老虎跳江面的455米，相对高差1525米，诸山陡峭壁立，地势险峻。境内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此地至今仍是青山绿水，且盛产松杉，为贵州的林区县之一。

台江原名台拱，在中国县级建制中开辟较晚，历代史志称为“九股（鼓）”。直到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年）始建台拱厅，之后台江苗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才开始为外界所知。据清代《苗疆闻见录》记载：“台拱厅，为镇远同知分驻之所。雍正间苗平，设以控制苗夷者。在府治南百二十里。厅西北九股河，一曰小江，自丹江流入，下注清水江。沿河以居者曰九股苗，曰横披苗，统呼之曰黑苗，最称犷悍。”^②民国二年（1913年）改厅为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贵州调整行政区域，改名台江县至今。台江在开辟苗疆之前，有400余寨，据《台江县志》记载：“大寨千户，中寨数百户，小寨数十户，人烟稠密。”从明代开始，汉人从省内的镇远、施秉、邛水（今三穗县）和省外的湘（湖南）、桂（广西）、川（四川）、赣（江西）各省进入台江，为军为仕为工为农为商贾，定居于营汛屯堡及水陆通衙的施洞、革东、南宫、平兆等集市，纯一的苗族成分开始改变。清代乾隆、嘉庆皇帝时期，边邻州县的侗、瑶、水等民族，零星地进入北部、中部或南部村落，与苗族杂居。自此以后，外来民族经过通婚联姻，大部分融合于苗族。现今，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台江总人口有16.72万人，其中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7%以上。^③

据调查，现今台江县境内进行龙舟竞渡的村寨属地自清水江上游施洞所辖南哨起，经四新、旧州、八埂、天堂、柏梓坪、方寨、塘龙、偏寨、石家寨、杨家寨，到下游的平

^① 台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江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② （清）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③ 参见台江县人民政府官网：《台江县概况》，<http://www.gztaijiang.gov.cn/pages/neiye.aspx?fenlei=872>，下载日期：2015年2月27日。

兆,以及流经台江县老屯乡、有施洞镇的巴拉河汇入清水江的入河口沿河十几公里的各苗寨,有施洞所辖巴拉河、平敏,老屯乡所辖白土、容山、老屯、稿仰、长滩等。

第四节 “施洞口”和清水江龙舟竞渡分布状况

施洞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北境,过去称“施洞口”,苗语发音为“展响”(Zangx Xangx),是清水江边的一个苗族市集。这里的海拔同台江县城差不多,约700米左右。气候温和、雨量适宜、灌溉便易、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主要种植水稻。据清代《苗疆闻见录》记载:“施洞口,在镇远府南六十里,台拱辖境。后倚高山,前临清水江,中饶平行,周数里。八埂倚其西,偏寨附其东,沙湾、岩脚、巴团、平地营蔽其前,九股河依其后,向为苗疆一大市会,人烟繁杂,设黄施卫千总驻之。”^①施洞在清代设石碉汛,民国年间设友驻镇。1953年建施洞、偏寨、平兆等7个乡。1984年,这7个乡并为施洞镇平兆、良田3个乡,1991年3个乡又合并为施洞镇。施洞镇下辖施洞街居民委员会(塘坝)及偏寨、小河、巴拉河、杨家沟等21个村委会、97个村民小组,共有4401户。现今全镇行政面积10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3037亩。

清水江是沅江的主源。发源于贵州省都匀市谷江乡西北,在都匀称剑江,都匀以下称马尾河,至岔河口汇入重安江后始称清水江,至湖南黔城汇入舞阳河后称沅江。干流全长459公里,主要流经都匀市、麻江县、凯里市、台江县、剑河县、锦屏县等地,在天柱县流出省境。流域面积17145平方公里,包括黔东南州、黔南州的16个县(市)。其流域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主要支流有重安江、巴拉河、巫密河、六洞河、亮江。^②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施洞地区沿江村寨的苗族青壮年男人,绝大多数都以舟楫运输为副业,也有一些贫寒人家的青壮年男人以专为船主撑船为生。一些较为富裕的,多自置木船从事商品运输,他们常为商人运出土特产至沅江,并顺便自买一些日用工业品运回出售。所以这里的经济很早就比较繁荣,当地人家的生活也比较富裕。

综合本节所述,从施秉和台江两县的历史沿革来看,可以说施洞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苗族的一大聚居地,而且过去被统称为“施洞口”,范围沿清水江两岸从施秉县的平寨起,下到料洞,又从巴拉河口起溯河而上至老屯。此外,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此范围正好属于龙舟竞渡的实施区域。经统计,清水江和巴拉河两岸的苗族村寨,多数都备有龙舟,几十户的村寨拥有一只龙舟,百户以上的村寨则一般有两只或三只。现今一共有三十多个村寨拥有龙舟,而且在近二十年内进行过龙舟竞渡(见表2-1),故此

^① (清)徐家干著、吴一文校注:《苗疆闻见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②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网站:《清水江概况》,http://www.gzdaxx.gov.cn/gzdaxx/dcgz/ftrq/2011-06-01/5723.html,下载日期:2013年11月14日。